



延安时期我们党创办了哪些干部学校

□ 赵耀宏 叶梦娇

办学的8年里共培养出1万多名干部，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在这类学校中，以专门培养抗战建国人才、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陕北公学最为著名。该校从1937年创办到1941年9月并入延安大学，共培养1万余名抗日干部，发展了3000余名党员。毛泽东高度赞扬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当年在陕北公学总校高级部二队学习的陈辛火深情地回忆：“没有课堂，就在窑洞前的坪地上、在树荫下的空地上上课。就是在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第二天，我们也照常到一个山坡上坚持上课。没有桌子、凳子，就席地而坐，膝盖就是活动‘桌子’。纸张困难，就用淡蓝色的马兰草造的纸写字，有时还用桦树皮写诗。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张张桦树皮，本身就是串串诗句啊！”“晚上一般用空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照明，有时还用老麻籽油点灯。光线虽然不够亮，但是大家为革命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围着豆粒大的灯光读到深夜……”

党群工作类干部学校，培养党的理论研究、领导骨干、党务和群众工作干部

为了培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造就党务和群众工作骨干，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中央党校、西北党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工人学校等。其中马列学院是党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是培养妇女干部和吸收敌占区的爱国女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是党成立以来创办的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专门学校；延安民族学院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这些都是党的干部学校教育史上的创举。

女大学员、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说：“延河成了我们的盥洗室，冬天敞开冰窟窿洗，夏天跳进河里冲。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洗衣服，要么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会时更唱，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丁雪松的回忆再现了当年干部学校的学习生活场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中央到陕北后，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恢复在瑞金建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改称为中央党校。中央党校作为最重要的干部教育阵地，为党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政英才。据曾任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的姚铁回忆：“一大批高级干部从紧张战斗的前方，陆续来到中央党校学习，都认识到这是党中央对自己的关怀，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这些同志见到马列主义的书籍，真是如饥似渴，爱不释手。他们白天读书、开会，晚上还在油灯下看《解放日报》等学习资料，从不放过一点时间。”著名作家刘白羽1942年至1944年曾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他在《我的人生转折点》一文中回忆说：我在延安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运动，最初引起我思想上震动的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入党”这一极其深刻而庄严的问题。他说：“我觉得使我受益最深的，就是学习了马列主义，然后用无产阶级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真联系自己，重新认识自己。”事实上这正是当年干部学校学员们共同的心路历程。

专门学院类学校，培养文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和社会建设人才

随着党的事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各级各类、各行各业干部。为此，当年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延安通讯学校、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陕甘宁边区艺术干校、陕甘宁边区职业学校、俄文学校、延安医药学校、延安药科学校、延安业余法律学校、鲁迅师范学院等，还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朝鲜革命军事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文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和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这些学校无论是组织机构和学制、教育方针、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不断补充、改革和完善的，都以适合敌后抗战和边区工作实际需要为准绳。

1938年4月在延安创办的著名的鲁迅艺术学院，坚持“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培养适合抗战建国需要之艺术文学人才，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民主主义的艺术文学而奋斗”的目标，在办学的7年半时间里，培养了各类专业人才和艺术骨干685人。著名作家茅盾在《记鲁迅艺术学院》一文中讲道：“在鲁艺，聚集着全国各省的青年……他们齐聚在鲁艺，为了一个信念：娴习文艺这武器的理论与实践，为民族之自由解放而服务！”由于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到抗日前线去，为抗战呐喊、为人民讴歌，鲁艺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谱写出造就革命文学艺术人才的辉煌篇章。

生是为中国 死是为中国

——刘伯坚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黄军红 何兵兵

刘伯坚烈士纪念碑位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城2公里的佛头山腰，碑高23.55米，状如一朵拔地而起、直冲霄汉的白玉兰花，喻示着刘伯坚的高贵情操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辉。含苞待放的花蕾更寄托着人们对英雄英年早逝的深深惋惜之情。纪念碑正前方的碑名“刘伯坚烈士纪念碑”8个鎏金大字由邓小平亲笔题写。纪念碑后座刻有由原文化部部长黄镇撰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坚事略》，全文如下：

伯坚谱名永福，后改永国，字毅伯，号铁侠，笔名大野（治）。一八九五年元月生于四川省平昌县龙岗乡，先后就读于金斗寨高小、巴州中学、万县师范和成都高师。

一九二零年赴比、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参与发起和组织苏联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旅比支部书记、旅欧总支部第三届书记。一九二三年赴苏学习，任旅莫支部书记。

一九二六年秋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委派，回国任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培训干部，致力北伐。大革命失败后，赴沪做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二八年春复赴苏学习军事，出席了中共六大会议。

一九三零年回国，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执行委员，一九三一年参与领导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旋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长征时留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江西仁风地区率部突围，不幸受伤被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三月二十一日，在江西省大余县英勇就义。高风亮节，气贯长虹，有《带镣行》、《移狱》等英雄诗篇和书简传世。

中共平昌县委 撰
平昌县人民政府
黄镇书
公元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碑文以朴实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刘伯坚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深切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

情，读来深受感动，催人奋进。

追求真理，点石成金。刘伯坚，1895年1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他自幼刻苦好学。1919年秋，刘伯坚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爱国青年，并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更加坚定了他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信念。

1920年6月，刘伯坚前往欧洲勤工俭学。1922年6月，他和周恩来等人发起并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11月，刘伯坚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1926年3月，刘伯坚奉命在莫斯科接待爱国将领冯玉祥。随后，刘伯坚经常与冯玉祥深入交谈，宣讲革命的大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冯玉祥的思想随之发生很大变化，觉得刘伯坚人才难得，力邀刘伯坚同他一道回国，主持西北军的政治工作。1926年秋，在刘伯坚的推动下，冯玉祥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宣布脱离北洋政府，组建国民联军，参加国民革命，刘伯坚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后任部长）。

为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革命队伍，刘伯坚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深为官兵们所景仰。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写道：“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宁都起义，铁流后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在军中“清党”，刘伯坚被迫离开冯部前往汉口。1930年秋，刘伯坚被派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在苏区长达5年的时间，刘伯坚与赣南这块红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情缘，也倾注了全部心血。

1931年12月14日，刘伯坚参与领导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宁都起义，为起义成功举行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次起义在刘伯坚的带领下，以极小的代价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部队17000余人浩浩荡荡



开赴苏区，随即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五军团为保卫中央苏区、壮大革命成果作出了重大贡献。长征途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排在队伍的最后，主要负责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他们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和悲壮的牺牲精神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有着“铁流后卫”的称号，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留守赣南，凛然就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伟大的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江西同国民党军作战时被捕。国民党军先是他关进了江西省大余县监狱，敌人为了劝降他，用尽了各种手段，可他却抱着“一死以殉主义”的决心，与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935年3月11日，在从大余县监狱移到绥靖公署候审的路上，敌人故意押着刘伯坚走过一条长长的青菜街，借以进行反共宣传，妄图从精神上打垮刘伯坚。出乎敌人预料，刘伯坚全然不惧，走过闹市时镇定自若、气宇轩昂地朗诵了一首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带镣行》，慨然面对嚣张逞凶的敌人和惊讶注

目的路人。1935年3月21日，他拖着沉重的脚镣，昂着不屈的头颅，高唱《国际歌》，随后从容就义，在大余县金莲山麓光荣牺牲，时年40岁。

家国情怀，忠肝义胆。刘伯坚与妻子王叔振育有3个儿子，但由于环境的恶劣和革命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将3个孩子都交给乡亲们抚养。刘伯坚无时无刻不眷念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在狱中写下了4封家书，字字句句催人泪下，充满着对信仰的坚守和饱含大爱的家国情怀。信中有“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豪迈，有“不须要找他们来营救我”的决绝，有“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的希冀，更有“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毅然决然。

在狱中写下的第4封信是刘伯坚临刑前写给王叔振的绝命书。信中写道：“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遗憾的是，王叔振并没有看到这封绝笔。因为王叔振已经先他一步牺牲在闽西游击区。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革命战争年代党如何保持组织纯洁

□ 高喜平 张欣毅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取得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走过了28年腥风血雨的战争岁月。在此期间，党为保持革命队伍的忠诚纯洁可靠付出了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

厉行洗党艰难探索。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宣告党的诞生。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在全党开始建立统一组织，严明纪律要求，彰显了维护自身组织纯洁性的决心与态度。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个在党内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专辟“纪律”一章，强调保持组织纯洁的具体要求。1926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内第一个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1927年，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的五大适时召开，深刻认识到纪检监察机构的重要性，产生了第一个党内监督机构，使党的纯洁性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1928年，在党的六大修订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充分理由连续三月不缴党费者，以自愿脱党论”。井冈山时期，党在制度建设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成功实践，主要包括民主集中制度、“支部建在连上”原

则以及党代表制度等。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坚持革命队伍的忠诚纯洁可靠付出了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

整风运动夯实根基。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整风运动提炼三大优良作风，其源头就是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学风文风》（后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进行了大量理论创作活动，详细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要建设的是“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延安整风是党处于局部执政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党在自身建设上的一次伟大创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证明，整风运动是解决党内矛盾问题的办法，适时的整党整风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与中心工作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避免偏差和失误。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大会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用毛泽东思想团结和组织纯洁。延安时期，著名的“窑洞对”是党关于历代治乱兴衰规律的初步探索，对于民主进步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一答案。党中央在延安生活、战斗的13年，使这里成为无数优秀中华儿女向往的圣地，革命事业从低谷走向高潮，并最终取得伟大胜利，而这一火热实践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模範样本。

制度管党走向成熟。解放战争时期，党为保持组织纯洁更加重视制度建设，突出强调有法可依。1947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同年发布的《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中规定：降低生活待遇，提倡艰苦奋斗；地方机关和军队后方机关，实行精简，提高工作效率；细心审核预算决算，核实人数，消灭虚报重领等浪费现象。这些

措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制度依据。

1947年秋至1948年底，根据全国土地会议关于整党工作的部署，各解放区采取党内党外结合等方法，普遍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基本内容的整党运动，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获得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194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还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为地名和街名等规定。总结梳理这些历史印痕不难发现，党愈发重视保持自身纯洁，在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不断健全完善，群众监督机制的日益畅通也是这一时期党关于纯洁性建设的主要特征。